

# 1949 年以来党和国家 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历程、经验与启示

胡洪彬

[提要]1949 年以来,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形势,党和国家把应对外部环境考验摆在了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上,为巩固执政根基和提升我国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提供了坚实保障。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外交奠基阶段,到 60 年代的外交艰难期,70 年代的外交开拓期,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新时期及十八大以后进入大国外交的新时代,70 年来,党和国家积累了有关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丰富经验,即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形成对外部环境考验的理性认知,必须把发展放在第一位,必须坚定改革开放信念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参与。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均处在历史转折点上,外部环境较之以往更加复杂,党和国家面临的外部环境考验也出现了新特征,借鉴历史经验,当前必须形成理论引领机制、动态评估机制、多边合作机制、多元协同机制及推进全球治理机制变革,以确保新时代党和国家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能力不断提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外部环境考验; 国际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 B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9)12—0183—11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共产党防范政治风险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研究”(2019(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胡洪彬, 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 研究方向: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浙江 杭州 310018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推进治国理政和大国外交战略过程中,将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应对外部环境考验摆在了突出位置上。早在 2014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工作作风建设集体学习会议上,就明确告诫全党必须深刻认识到当前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切实做到“居安思危”<sup>[1](P.6)</sup>。2019 年 1 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则具体就应对外部环境风险等命题作出了深刻阐释。他指出,当前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坚决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外部环境”<sup>[2]</sup>。近年来,伴随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中美经贸摩擦的不断升级,党中央高度重视外部环境考验的应对工作,既是分析当前国际形

势和周边环境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那么,到底该如何认识党和国家面临的外部环境考验?抑或如何才能形成科学的应对战略?这是当前亟须作出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要科学加以破解,不仅需要在外交实践中总结经验,同时也需要在历史经验中找寻答案。本文在分析 1949 年以来党和国家应对外部环境考验历史进程的基础上,系统提炼和总结了其中的有益经验,并结合当下党和国家面临的新形势,以史为鉴阐释了新时代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启示路径,以期对党巩固执政和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提供借鉴。

### 一、1949 年以来党和国家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基本历程

所谓外部环境考验,简言之即党在执政过程中面对的来自国际社会的挑战,是我们党面对波

谲诡的全球形势,以及复杂敏感的国际格局,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不断进行伟大斗争,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遭受到的来自国际环境的各种消极阻滞因素及各类风险与危机成分的总和。从整体上看,外部环境作为党和国家同其他国家、政党和社会组织建构和形成的关联性,本身是极为复杂的,是由政治角逐、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要素构成的有机统一体,这决定了党和国家面临的外部环境考验也必然是多方面的,除了要应对贸易层面的经济考验外,来自外部的政治、文化和安全层面的考验亦是其中重要成分。从过程上看,外部环境考验也绝非一成不变,其同样要伴随国际形势的改变,以及党和国家对外关系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70年的执政生涯中,面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形势,结合外交政策演变提出了不同的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策略。在此过程中,不仅为党的执政和国家发展赢得了良好的国际空间,也为开创和形成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一) 外交奠基期党和国家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基本战略(1949~1956)。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新中国的诞生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标志着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开始走上了独立、民主、统一的发展道路。此后,随着我们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党的外交模式也从政党外交向国家外交进行转变,其开始作为独立性政治主体的领导者走向世界。<sup>[3]</sup>由此,党和国家面临的外部环境考验也接踵而至。尤其是在二战后美苏两极争霸的格局下,境外敌对势力虎视眈眈,试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给党的执政带来了巨大挑战。概言之,从1949年到1956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这期间作为我国外交的奠基阶段,党和国家面临的外部环境考验主要来自两方面:1. 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新中国的成立得到了苏联、东欧等国的支持,但也遭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对,其在军事上对我国展开战略包围,企图将新政权扼杀在摇篮中。1950年夏,美国不顾中国政府警告,将朝鲜战争的战火烧至中朝边境,并

将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还多次指派侦察机进行秘密侦察,以获取军事情报,导致我国国家安全受到极大威胁。2. 资本主义阵营的经济封锁。新中国的成立,在改变国际政治格局的同时,也给整个资本主义阵营带来了巨大冲击。为维持其在两极格局中的优势地位,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展开了长期的经济封锁和禁运。1949年11月,美英法德等国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将中国列为重点封锁对象,不仅限制向我国出口战略物资,更直接阻挠其他国家商船进入中国港口。统计显示,仅1950至1953年,外部经济封锁就造成我国经济损失5691万美元,这对新中国的经济恢复无疑是个制约。<sup>[4]</sup>

面对境外敌对势力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带来的巨大考验和冲击,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态度坚决、意志坚定,明确强调要“把社会主义国家巩固起来”,做到“寸土不让”,“谁要我们让,就一定跟他斗争”<sup>[5] (P.188)</sup>。由此,党和国家确立起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并立足3方面展开应对工作:1. 在国际关系上,通过与苏结盟,以实现“联苏抗美”。早在1950年初,中苏两国就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采取措施”,以期制止“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一方受到侵略,另一方应立即尽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sup>[6] (P.119)</sup>。显然,该条约的签订以及中国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对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是有威慑作用的。2. 在对外贸易上,广泛展开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其中,根据中苏双边协定,中国争取到了苏联3亿美元低息贷款,以及此后的150余项重点援建项目。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同西方国家贸易额的不断下降,我国也积极同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等国签订贸易协定,展开了广泛经济贸易关系,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急需的外汇资金,也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奠定了根基。3. 在国家主权上,针对美军在朝鲜战场越过三八线,严重威胁我国主权的紧急状况,党中央坚定地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有效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也充分彰显了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和保家卫国的信心和决心,为捍

卫新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安全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二) 外交艰难期党和国家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基本战略(1956~1972)。

1956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完成,中苏之间也开始出现摩擦,两国关系逐渐陷入不正常状态。此后,随着中苏关系及整个国际形势的转变,我国的外交也开始走入艰难期,期间党面临的外部环境考验也随之发生改变。概言之,此后至1970年代初,党面临的外部环境考验主要来自于美苏两方面:1. 从中苏关系的角度看,主要表现为两党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及苏联的霸权主义威胁。早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执政理论的全盘否定,中苏两党便开始出现意识形态分歧,1960年代后,这种分歧随着两国利益冲突的加剧而愈发激烈,并逐步向军事冲突进行演变。1968年,苏联在中国新疆附近大量增兵。1969年,双方更是在新疆铁列克提及乌苏里江珍宝岛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一系列事件的爆发不仅导致中苏关系降至冰点,也给我们党的执政带来了严峻的外部威胁。2. 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看,主要依旧表现为两国间的对抗及美方的封锁与遏制。1958年,为推进祖国统一,中央决定对据守金门的国民党军展开炮击封锁行动,美方趁机将其在台湾海峡的干涉范围扩大至马祖和金门等地,进一步干涉中国内政。不仅如此,美方还在我国周围建构包括日本、菲律宾和泰国等在内的军事联盟,并派遣地面部队直接侵入越南,威胁中国南大门的安全,致使中美关系走向重蹈朝鲜战争覆辙的现实危机,由此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进一步加剧。

对于20世纪50年代后中苏交恶、中美对抗带来的艰难困局,党中央绝非束手待毙,而是积极在美苏之外寻求新的突破路径。1962年,毛泽东在同外国友人的谈话中进一步阐释了其“中间地带”的外交理论。毛泽东认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为“第一中间地带”,欧洲、加拿大、大洋洲及日本为“第二中间地带”。<sup>[7] (P. 345)</sup> 这些中间地带国家同美苏之间绝非铁板一块,而是一支可争取的间接同盟军。周恩来也认为,要切实“打破两个超级大国在我们周围筑起的高墙,必须走出去”<sup>[8] (P. 180)</sup>。由此,我们党逐步形成了“两个中间地带”的外交

突破战略,并以此为基础从两个方面展开对外部环境考验的应对工作:1. 着力强化同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联合反对美苏的霸权与压迫。据统计,至1969年底,同我国建交的亚非拉国家达到49个。<sup>[9] (P. 134)</sup> 中国和同广大亚非拉国家的联合,不仅推进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同时也壮大了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力量,并为反对美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提供了更加广泛的支撑。2. 着力改善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以推进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成果就是中法之间于1964年实现正式建交,中法建交不仅意味着我国同西欧国家的关系实现重大突破,同时也标志着美国扼杀、封锁新中国政策的彻底破产。可以说,这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外交上不畏惧、不退缩,成功顶住了美苏两大国的外部压力,也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 外交开拓期党和国家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基本战略(1972~1978)。

进入70年代后,国际局势进一步发生新变化。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霸主的美国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形势下滑严重,再加上深受越战的拖累,国内反战示威此起彼伏。另一方面,随着苏联军事实力实现对美反超,其走向了“进攻性战略”,不仅与美国争夺欧洲,更在亚非拉不断扩张势力范围,渐成世界和平新威胁。从中苏关系看,进入70年代后两国关系虽有一定缓和,但苏联对中国的遏制依旧未变,期间不仅在两国边境不断增加兵力,甚至挑唆印度反华,试图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之势。显然,这期间“同美国相比,苏联对中国构成了更大的威胁。”<sup>[10]</sup> 也成为该时期党面临的主要外部环境考验来源。面对“美守苏攻”的国际新形势,党中央适时调整应对方案。一方面,实现中美的高层政治接触,以在整体形势上达到联美抗苏的国际格局。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结束了两国的敌对状态,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使中国战略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无论是对党和国家的发展,还是对区域和平与稳定都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界限,不断推进同西方国家的外交往来。1974年,毛泽东会见赞卡翁达时提出了著名的“三

个世界”划分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党中央在对外关系上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在继续强化同第三世界国家合作的同时,进一步改善了同欧洲、日本等第二世界国家的外交关系。以欧洲为例,截止70年代末,除了安道尔等四国外,中国已同该地区所有国家实现顺利建交。从1973至1977年,中国同日本、西德等国签约和成交的技术引进项目总价值已达到39.6亿美元,对国内经济建设带来了积极影响。<sup>[11] (P.505)</sup>可见,这期间党中央外交局面的创新与开拓,不仅有效抵御住了苏联的霸权主义威胁,也为党和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外交新时期党和国家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基本战略(1978~2012)。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也标志着中国外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的推进,打开了国家发展的新天地,但同时也使我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进而给党的执政带来诸多新挑战。此后一段时间内,党和国家面临的外部环境考验主要集中在三方面:1.全球化下的经济安全冲击。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国际分工与人类科技的不断发展,生产、贸易和金融等领域的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资金和技术,但客观上也冲击着我国的经济主权,一些发达国家凭借技术和资本优势,不仅影响着我国的产业和贸易结构安全,而且伴随中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中国受国际经济形势和危机的影响也愈发深刻,这一切都给党领导经济工作带来了诸多新难度。2.霸权主义下的政治安全威胁。19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意味着全球两级格局的终结,但冷战结束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旧存在。随着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强国,为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干涉他国内政的情况亦愈发普遍。以台湾问题为例,自中美“八·一七公报”签署以来,美国就已先后对台军售80余次,累计金额高达520多亿美元。<sup>[12]</sup>此外,美国还在涉藏、涉疆问题上对中国多次进行无端指责,可谓直接构成我国的政治安全威胁。3.国际共产主义低潮下的意识形态渗透。苏东剧变在结束冷战的同时,也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入低谷,由此给西方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土壤,一些西方学者或渲染“历史终结论”,或以人权、民主等为借口对我进行发难,并推销其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妄图对我进行和平演变,使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受到挑战。

针对改革开放环境下的外部环境考验,新时期以来党中央立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着力从理念和布局上作出了回应:1.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冲击,力主深化改革开放和参与国际分工。早在1984年,邓小平就讲到“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sup>[13] (P.78)</sup>。此后,改革开放逐渐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从经济特区的设立到顺利加入WTO,其间我们既引进外资技术又改革国内经济制度,既调整产业结构又参与国际经济协调,中国经济的风险抵御能力不断提升,国内经济水平也实现了快速腾飞。2.为应对霸权主义威胁,力主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86年,邓小平明确强调“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sup>[14] (P.162)</sup>。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又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以确保各国都能得到相互尊重和实现发展。这一系列理念的提出为新时期应对西方霸权主义威胁和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奠定了坚实基础。3.为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力主抵制西方普世价值观。1986年,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就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作出了深刻批判,认为其本质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sup>[15] (P.181)</sup>,他主张坚决抵制和深刻批判。此后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领导下,党中央从政权建设出发,进一步对西方资产阶级错误思潮展开延续性批判,为确保党和国家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提供了理念支撑。

(五)外交新时代党和国家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基本战略(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执政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形势均发生了深刻改变,对党的执政与建设也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和新任务。概言之,新时代党面临的外部环境考验主要集中于3个层面:1.政治上,单

单边主义重新抬头,为我国的和平发展设置重重障碍。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治生态趋于保守,美国在国际关系上的单边主义行径也变得肆无忌惮。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借口下,美国不仅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鼓吹“中国威胁论”,妄图对我展开“颜色革命”,而且不断挑拨中国同印太国家的紧密关系,企图对中国的战略空间形成制约。2. 经济上,贸易保护主义不断蔓延,对我国经济发展进行蓄意打压。在单边主义政策的驱使下,特朗普政府亦在经济上走上了逆全球化的怪圈,并将贸易保护主义视为自身政策核心。在此之下,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美国三番五次挑起贸易战,对我国设置关税壁垒,其根本目标就是阻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3. 安全上,传统因素和非传统因素相互交织,党的执政与国家安全面临较大挑战。从“印太战略”到南海“航行自由”,西方国家不仅极力强化其亚太军事力量,而且不断煽动相关国家挑起争议,导致中国周边安全局势变得更为严峻。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转变,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科技竞争等带来非传统安全难题亦不断涌现,如何形塑对我国发展有利的国际环境,依旧是当前党和国家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对于新时代党面临的外部环境考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理论和行动两方面作出了坚定的回应:1. 在理念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理念,力主打造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早在2013年,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就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唯有合作“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sup>[14] [P. 272]</sup>。2015年,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时,习近平更是明确提出了“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展现博大胸襟和历史担当的同时,为党的执政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2. 在行动上,形成了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合作倡议,以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截至目前,该倡议得到了全球共计100余个国家与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参与,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公共产品。可以说,新时代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准确把握住了纷纭变化的国际形势,开启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时代,也为应对外部环境考验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1949年以来党和国家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经验提炼

从1949至2019年的70年,是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70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波澜壮阔的70年,从20世纪50年代初党作出“一边倒”外交方针,以实现“联苏抗美”,到70年代以极大政治勇气做到与美的高层政治接触,以实现“联美抗苏”,从新时期以来党坚定地做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以实现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理念,以打造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70年来,党领导人民在进行国家治理的过程中,不忘初心、奋勇直前,可谓承受住了一个又一个外部环境的考验,抵御住了一个又一个外部风险的挑战,从而在对外部环境考验的认知、识别及判断上,实现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转变与升华,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在世界范围内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中华民族才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70年党执政生涯的光辉实践,不仅为党的长期执政提供了坚实根基,也为党和国家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通过上文对70年来我国应对外部环境考验基本历程的分析,可将这些经验归纳为以下五方面:

(一) 在根本核心上,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和参与国际事务的根本主体。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我们要有效应对各类外部环境的考验,首要前提就是必须把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核心摆在首位。早在1952年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

胜利”<sup>[5] (P.303)</sup>。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他又强调,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专政”的作用之一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sup>[5] (P.207)</sup>。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也力主党的领导核心不动摇,否则“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sup>[15] (P.267-268)</sup>。1986年,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时,他更明确强调“否定党的领导”,人民就“没有凝聚的中心”,“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盘散沙”<sup>[13] (P.197)</sup>。可见,党的领导构成了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根本保障。坚持党的领导,就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信念,从坚定地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到万隆会议上面对一些国家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明确提出“求同存异”以促成共识,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70年来的历程已充分证明一条铁律,即只要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想和信念,党就能有效克服外部环境的考验,反之,就必然存在被外部风险侵蚀的危机。基于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党的领导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sup>[16] (P.20)</sup>。因此,要有效应对外部环境考验,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本前提,唯此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推进民族复兴的伟业不断向前迈进。

(二) 在战略思维上,必须结合国际形势形成对外部环境考验的理性观念和科学认知

面对诡谲多变的国际形势,党和国家要有效应对,首先在战略眼光上就要高瞻远瞩,如此才能在科学认识中形成理性策略。分析70年历程,我们可从中得出三条基本经验:1. 科学认知外部环境考验,必须形成主动性观念。1949年底,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就鲜明指出“中国近一百年来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今天我们“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sup>[17] (P.61)</sup>。此后,无论在美苏两大阵营间,我们积极发展同缅甸、印度等中立派的对外关系,还是60年代面对苏联对珍宝岛的安全威胁,我们以备忘录的形式作出先期回应,其间透露出的都是党和国家对外

交主动性的积极把握,由此才在克服外部环境考验的过程中,为新中国发展开拓了广阔空间。2. 科学认知外部环境考验,也要树立全球性视野。从“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到1950年代团结广大亚非拉国家,反对美苏争霸的“两条线”战略,再到1970年代展开“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布局,并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党领导和处理国际事务的战略眼光从来都是高屋建瓴的,由此才在不断分化和组合的国际政治力量中,创造出对我有利的外部环境,这也表明科学认知外部环境考验,也须树立全球性视野,由此方能在把控全局中不断开辟新路。3. 科学认知外部环境考验,党和国家还要树立发展性视野。70年代后党适时调整外交布局,并实现了中美两国的正式建交,这一创新举措不仅为东西方全面交流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党在美苏争霸的困局下实现了“化危为机”,这表明对于外部环境考验的认识也必须树立动态观、发展观,由此才能在着眼于未来的智慧中形成科学的评估和判断,进而对外部环境考验的演变规律作出更加深刻的分析。

(三) 在战略支点上,必须把根本重心放在对本国的发展和建设上

70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在外交上不断突围,战胜外部环境考验,根本原因就在于本国的不断强大。1949年后,面对美帝国主义对我的经济封锁与禁运,我们在着力争取苏联支援的同时,就极为重视做好相关经验和技术的消化和吸收,并将其视为战胜外部环境考验的根本保障。1958年,面对中苏关系破裂带来的外部挑战,毛泽东更是要求做到破除迷信,自力更生,在他看来,“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sup>[5] (P.77)</sup>。当时主管科技工作的聂荣臻也曾指出“我们不能排除在互利原则下的外援”,但“立足点必须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否则将“被别人牵着鼻子走”<sup>[18] (P.183)</sup>。在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下,我们成功掌握了原子弹、氢弹和导弹发射等先进技术,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并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稳了脚跟。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明确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且发展必须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展开,“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sup>[13] (P.57)</sup>。由此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在带领人民走上

富裕道路的同时,不断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正是基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取得全方位的伟大成就,由此才为开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提供了坚实支撑,才得到了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70年的历史留下的宝贵经验就在于,党和国家唯有把自身发展摆在核心位置上,才能在世界交往与国际竞争中保持独立性,才能从根本上不断提升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能力,进而完成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四)在目标导向上,必须坚定改革开放信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

从70年历史经验看,应对外部环境考验,要坚持主动就要有开放性的胸襟和信念。改革开放之前,在阶级斗争的干扰下,国内发展几乎陷于停滞,我国经济水平不仅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拉大,甚至被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甩在了后面,由此也给党的执政带来了巨大考验。面对这样的情境,邓小平明确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sup>[13] P.117</sup>。中国必须打开国门,否则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近40年来,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不仅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位,而且我国的外汇储备、制造业和国际贸易规模均实现了飞速发展。可以说,改革开放构成了中国把握战略主动的关键一招。有效应对外部环境考验,更要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当中去。1950年代,全球治理体系包括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政治安全治理体系,及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经济治理体系,主要皆掌控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手中,我们不仅被排除在外,而且其还通过多种措施对我进行干涉和指责,给党的执政和国家发展带来巨大的外部压力。为打破僵局,中国不仅通过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途径,阐明中国外交的立场和基本原则,而且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此后,随着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国更是在维护世界和平,及强化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中国的全球治理参与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

公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显然这对于规避外部风险亦是有利的。

(五)在力量来源上,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

人民是社会历史的创造主体,也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决定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其长期执政的根源来自于人民的拥护与认可,其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根本力量同样来自于人民的理解与支持。外交工作以维护国家主权、国土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旨归,说到底就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的支持构成了党和国家把握外交主动和克服外部风险的内在支撑。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展开外交工作的70年光辉历程,不难发现,无论是在外交奠基阶段,还是1960年代的外交困难期,对主权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维护,始终是党和国家外交工作的根本前提,也是党在执政中遭遇外部风险时,最终都能逢凶化吉的内在根源。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sup>[19] P.1031</sup>“只要我们依靠人民”,“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sup>[19] P.1096</sup>。1950年,针对美帝国主义对台湾问题的干涉,毛泽东就指出“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因为它没有人民的支持”而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只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就能“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sup>[20] P.137</sup>。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更是将人民“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等视为党和国家制定各项政策及外交方针的根本出发点,并直言改革开放的过程要规避各类风险和取得成功,就必须做到“密切地联系群众”和“代表群众的利益”,由此“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sup>[15] P.342</sup>。70年来,党和国家能够不断克服外部挑战,在迂回曲折中取得伟大成就也充分表明,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也即,坚持以人民根本利益为本推进外交工作,亦构成新中国70年来党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一条重要经验。

三、1949年以来党和国家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前瞻启示

(一)当前党和国家面临的外部环境考验有哪些新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国际形势也开始走入新的历史转折点,党

和国家面对的外部环境又发生了新的改变,面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带来的新情况,新时代党要做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首先就须摸清当下面临的外部环境考验的新特性,如此才能在以史为鉴的基础上实现创新突破。概而言之,笔者认为,这些新特征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1. 从外部环境考验的来源看,更具复杂性的特征。外部环境考验作为党和国家面对的外部危机,本身就是一个由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及意识形态等多方面构成的整体性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国家安全是一个‘涵盖领域十分广泛’的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时刻面对各种风险考验和重大挑战’<sup>[14] (P.381)</sup>。从70年来党和国家开展对外交流的基本历程看,如果说在两极争霸格局期间,党和国家面临的外部环境考验主要源于美苏两大国交替带入的军事威胁和意识形态冲突等层面,那么,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世界多极化的不断发展,党和国家在当下面对的外部风险因素显然要更为多元化和复杂化了。从整体上看,其中既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传统性因素,也有手段不断翻新的意识形态渗透及逆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等,从区域角度看,领土争端、海权纠纷及挥之不去的恐怖主义阴影依旧困扰着中国的崛起,可以说,整体上呈现出传统安全性考验和非传统安全性考验相互交织的新局面。正因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当前我们面对的环境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及“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必须深刻认识“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走向纵深化。<sup>[16] (P.60)</sup>

2. 从外部环境考验的表现看,更具直接性的特征。冷战结束以后,随着美苏争霸格局的终结,欧盟、日本等地区 and 国家的崛起,及改革开放后我国综合实力的飞速增长,世界总体形势已趋向缓和,期间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及国际组织等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也明显增加,这些都为党和国家的发展带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然而,自特朗普上台以来,这一国际秩序开始受到挑战。一方面,为标榜“美国优先”,2017年以来,美国政府已先后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个国际性规则和机构,践踏国际多边机制,破坏国际规则对

风险的协调与缓冲作用。另一方面,为确保美国利益,不惜绕过甚至挑战国际规则干涉他国事务,不仅肆意对伊朗、委内瑞拉等国进行制裁,更将矛头直指中国,采取极限施压的恶劣做法对我国展开打压,不仅动辄就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更对包括中兴、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进行无端围剿,美方的单边主义、霸凌主义行径,既严重破坏了当今世界贸易体系和国际秩序,也给我们党的执政和国家安全带来了直接性挑战。

3. 从外部环境考验的影响看,更具威胁性的特征。当今时代波诡云谲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单边主义、贸易霸凌主义等的抬头,在诱发直接经贸冲突的同时,也在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国际风险的消极后果,由此给我国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威胁性。冷战时期,国际体系相对较为封闭,中西方之间联系亦不紧密,党面对的外部环境考验也相对单一,但随着近年来世界多极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及全球范围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显然这一格局早已被打破。现代通讯方式的更新换代、跨国资本的频繁流动及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世界俨然成为一个“地球村”,中国同世界的相互依赖性也空前增强,在给我国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给外部风险的蔓延提供了更加便利的空间,进而带来更大破坏力。正如吉登斯所言:“较多的相互依赖,意味着在作为一个整体而影响那些系统的不幸事件,在发生时就会有更大的易受伤害性”<sup>[21] (P.157)</sup>。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中国的不断崛起,一些西方国家不仅在经济上科技上对我展开“孤立战”“破坏战”,更加紧策动“颜色革命”和“政治转基因工程”,进而给党的执政和国家发展带来更大更多的挑战,一旦处理不当便极可能对国家安全带来巨大威胁,造成党执政公信力的流失。面对当下的外部环境考验,党和国家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着力做到有效应对。

4. 从外部环境考验的走向看,更具不确定性的特征。外部环境考验作为来自国际社会的风险和挑战,本身既有着长期性、复杂性和威胁性特征,同时也具备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当今的国际政治实践存在着大量以“常规经验与理性推导难以解释的非线性现象”,其“发展路向充满了偶然性和变数”,“用决定论眼光看待世界已成过时

现象”<sup>[22]</sup>。如果说在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下,以对抗性为主的中西方关系,为我们党感知外部风险和考验提供了便利,那么在世界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联系日趋紧密的今天,显然这种不确定亦得到了强化。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早在2017年底,中美双方就已达成高达2535亿美元的经贸合作协议,但仅半年不到,美方就抛出针对中国的“232调查”和“301调查”,2018年以来,中美双方又展开多次谈判,期间中方一直保持着最大的诚意,但美方依然频频出尔反尔,肆意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上的善变性,不仅使风险跨境传染的可能性大大提升,同时也给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再如此次的华为事件,美方为达到其战略遏制目标,不惜散播谣言对我进行抹黑,企图误导各国民众,甚至胁迫其他国家参与围剿,这在以往是没有的。可以说,在当今世界波谲云诡的环境下,一些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客观上加大了党和国家的应对难度。

(二) 70年来党和国家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前瞻性启示

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复杂变化的世界”,要“不惧风雨勇向前,积极迎接各种考验”,“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捍卫国家利益”<sup>[23] (P.6)</sup>。当前,党和国家面临的外部环境考验及其上述新特征,决定了党要切实做好外部环境考验的应对工作,进而实现化危为机,就绝不能仅停留在对历史经验的借鉴上,更要善于以史为鉴做到突破创新,笔者认为,通过对70年历程的归纳分析和经验提炼,可为新时代党和国家进一步提升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能力提供以下5个方面的启示:

1. 新时代提升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能力,在战略核心上要形成理论引领机制。理论是实践的基础。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和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考验,党和国家要做到科学应对、有效应对,首先就要通过机制建设推进相关治理主体实现理论更新。具体而言:(1)在理论内涵上,要把学习和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摆在核心位置上。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准确把握中国和世界大势的

基础上,在外交工作中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战略,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等等,这些理论有着高度的包容性与广泛的适应性,是新时代党驾驭复杂国际形势的深刻总结,必须通过机制建设加以明确,为应对外部环境考验提供根本指引。(2)在理论展开上,要形成严密的贯彻实施机制,确保科学理论的有效落实。其中既要强化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要不断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力度,确保党中央对外方针和政策落到实处,由此两方面形成坚定党的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信念,为保持战略定力、强化战略自信奠定坚实基础。

2. 新时代提升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能力,在具体过程上要形成动态评估机制。70年的历史经验说明,要有效防御和化解风险,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科学认知和界定风险,对外部环境考验的把握亦不例外,由此方能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真正做到“有的放矢”,要达至这一目标,就必须积极形成相应的动态评估机制。这里的动态评估机制,简言之即针对当下外部环境考验的来源、过程及影响作出评价、分析和论证的制度与方法论体系。目前,评估机制建设在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等层面的应用已较为成熟,为防御社会经济风险带来了积极意义。随着近年来党和国家对外部环境考验的不断重视,这一机制亦应“由内而外”实现拓展,为维护党和国家的战略安全提供保障。对此应做好两方面:在评估范围的界定上,要立足于国际局势的整体发展形成动态分析机制,既要把握全球发展脉搏,又要认清我国发展现实,从而在厘清外部环境考验影响、特性、趋势及其演变规律的基础上,得出相应的反制举措和应对战略,为党的执政和国家发展提供坚实的学理依据。在评估主体的选择上,在坚持政治引领的同时,则要积极整合国内各相关智库的研究力量进行参与,在提升评估科学性的过程中,为强化各级党政机构对外部环境考验的认知能力提供帮助。

3. 新时代提升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能力,在战略展开上要形成多边合作机制。多边主义内蕴着平等协商、开放包容和合作共赢的基本精神,是

当今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近期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行径本质上是对国际多边主义的挑战。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面对贸易摩擦带来的严峻考验,我们要实现有效应对,就必须坚定地同世界大多数国家站在一起,以进一步形成多边合作机制。对此,在战略展开上应重点把握两方面:(1)要以维护国际规则为前提,坚定地推进多边贸易和自由贸易。入世以来,中国通过缔结一系列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国际贸易实现了飞速发展,这充分说明多边机制对化解外部风险是有积极意义的。以中美关系为例,两国从对立到建交再到并肩的70年历史,也充分证明二者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当前,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单边主义,以在现有国际机制下积极展开双边和多边合作,推进国际贸易法治化和维护多边贸易的稳定性。(2)要以坚持对外开放为基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向纵深化发展。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sup>[24] (P.11)</sup>“一带一路”源自中国,但成果与机会则属于全世界。有效应对外部环境考验,我们也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同世界各国在政策、设施、贸易、资金等方面形成更加紧密的连通机制,为建构以合作共赢为目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4. 新时代提升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能力,在谋略上要积极推进全球治理机制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sup>[25] (P.274)</sup>。目前,全球治理体系还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色彩。以评价指数为例,当下流行的如世界法治指数、国家清廉指数等,主要都被西方国家垄断和操纵,有些已沦为对我国进行舆论攻击的手段。<sup>[26]</sup>要规避这些外部风险,党和国家在坚定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的同时,必须积极推进全球治理机制的变革。对此,我们一方面要积极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原则与宗旨的国际治理体系,在联合国的框架内促进国际关系重组,反对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逻辑,推进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的道路发展。另一方面

也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执行工作,既要不断强化我国在国际和区域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力争在全球治理机制建设中起到主导性作用,又要积极参与国际执法,以联合国际社会共同打击对我威胁的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以不断展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气象和新作为。

5. 新时代提升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能力,在内部治理上还要形成多元协同机制。从70年来党的执政历程还可看出,要更加自信且有效地做好外部环境考验的应对工作,同样离不开国内各机构、各部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参与与配合。早在2013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曾讲到,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党要继续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就必须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否则“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sup>[27] (P.3)</sup>。当前,在关乎我国民族复兴大计的关键时刻,面对西方国家霸凌主义和肆意打压的野蛮行径,我们更要团结一心,通过整合多元力量进行协同作战,以推进摩擦争端向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解决。一方面,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要着力形成各级政府、行业协会、各类企业以及预警机构在内的全方位协同配合机制,促使各机构各部门都能明确自身职责和具体分工,并形成联动作战效应,以在协同配合中把外部风险降至最低。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对外部风险形成正确认识,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进而促其自觉地参与到维护党和国家利益的实际行动中来。由此在建构普遍的社会共识的基础上,为应对外部环境考验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

#### 余论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当前“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sup>[16] (P.25)</sup>。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最大的执政党,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力,本身是在各种外部环境的考验中成长起来的,也是在同各种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坚决斗争中不断走向强大的,这构成了党不断实现胜利的重要原因。2019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中

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更是明确昭告：“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面对各种风险和挑战，中国有信心迎难而上，化危为机”<sup>[28]</sup>。本文归纳和提炼了70年来党和国家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在着力分析当下党和国家面临的外部环境考验的新特性的基础上，阐明了历史经验的启示性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的，“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我们“不仅要看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sup>[29]</sup>当前，要积极应对好西方国家的恶意打压，进而不断扭转对我不利局面，就必须高度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发展创新，唯此才能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2] 习近平. 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N]. 人民日报，2019-01-22(01).
- [3] 牛军. 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J]. 历史研究，1999(5).
- [4] 董志凯. 建国初期新中国反“封锁”的效应和启示[J]. 经济研究参考，1992(6).
- [5] 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6]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7] 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8] 陈敦德. 探路之行：周恩来飞往非洲[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 [9]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 当代中国外交[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10] 颜永琦. 新中国“一条线”外交战略评析[J]. 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1).
- [11] 房维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2009)[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 钟声. 并不高明的造谣术[N]. 人民日报，2018-10-06(03).
-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15]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6]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7] 李连庆. 大外交家周恩来(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8] 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
- [19]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0] 毛泽东外交文选[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 [21] [英]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赵旭东，东方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8.
- [22] 田文林，林海虹. 论国际政治中的非线性效应[J]. 现代国际关系，2001(12).
- [23] 习近平. 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24] 习近平. 弘扬传统友好，共谱合作新篇——在巴西国会的演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25]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26] 高奇琦. 构建国家治理指数[N]. 人民日报，2015-08-30(07).
- [27] 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28] 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N]. 人民日报，2019-06-03(08).
- [29] 习近平.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N]. 光明日报，2018-06-24(01).

收稿日期 2019-09-18 责任编辑 杨春蓉